

青年学术丛书·历史

YOUTH ACADEMIC SERIES-HISTORY



周公研究

吕庙军 著



人民出版社

青年学术丛书·历史

YOUTH ACADEMIC SERIES-HISTORY



周公研究

吕庙军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公研究/吕庙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青年学术丛书)

ISBN 978-7-01-010786-8

I. ①周… II. ①吕… III. ①周公-人物研究 IV. ①K82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4483 号

周 公 研 究

ZHOUGONG YANJIU

吕庙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35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0786-8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一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研讨在方法论或考古新出证据方面都有极大的进展。但对持重的史学家来说，“周公”仍是一个谜——一个神话式的“传奇”。当吕君庙军向我提出以“周公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我是相当不以为然的。为了避免对年青学人作出过于消极的回应，我劝他先去把《古史辨》细阅一遍，再作决定。两年多以后，我阅读他寄来的《周公研究》，不禁大出意料之外，并叹为观止。书中对当代国内关于“周公”各方面问题的研述，作了合理的论析，并提出了平实的看法。

中华古史屡称“上古三代——夏商周”；近百年来的考古收获更大大扩充了人们的视野。在旧石器时代，人们靠的是大地的自然物（由石块到飞禽走兽和水产）；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制造陶器，发展农产与畜牧，因各地方不同自然环境之宜，建立了不同的地方文化和社群，及其所畏惧、敬爱、崇拜的对象“社”。中华境内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在万数以上，其所敬奉的“社社”也应在万数以上。传说夏后氏之王，执圭而朝者万国，大概已经减少了很多“失国家，危社稷”的方国了。到了殷商（约公元前1711—前1111年），《公羊传》说有“三千诸侯”——“失国家，危社稷”的方国已达70%以上；周初“[千]八百诸侯”，更是十不存一了。

这些数量众多的方国社稷是如何消失的呢？这和中华古代地理的场境有密切关系。由于中华大地整体连接而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这些满天星斗的地方文化不断地互相竞争，互相影响。互动的结果，可能是和平互惠的，也可能是残酷的摧残。这产生了两种不同方式的文化“超越”和两种互应的超越后效——民粹文化的早熟和早衰。显示在现存中华神话传说中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本架构：创世诸神之死和历史英雄的谱系。这是20世纪早期“古史辨”大师们

的主要研究成果。欧洲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古代中华传说与民粹宗教》中把现存的神话传说文献考证系年，推断这些神话人物之能够在口头上传下来，而后来以文字记下，是因为他们在商周时仍有后人祀拜。德国文化人类学家艾伯赫（Wolfram Eberhard）在《中国地方文化》（上册《北部与西部地方文化》；下册《东部与南部地方文化》），看法则与高本汉相反，认为地方文化常常能历时久远而长存于民粹里。这两种观点显示了古代中华域内各地民粹的两种命运。中华古典“天圆地方”的宇宙，和“方趾圆颅”的人体，意涵的正是这两种民粹的二元哲理化（《淮南子·精神训》）。《五运历年纪》的“盘古神话”，《淮南子》、《诠言训》、《天文训》的“混沌”、《精神训》的“二神”都是天和地并称的。

“天”对早期迁徙不定的周人而言（《史记·周本纪》），是远远比“地”为重要的（两三千年后的契丹、辽、金、蒙古和满洲人仍保留了这民粹）。西周继殷，把“天”、“天下”、“天命”、“天子”提升到最高（层次）和最大（领域）的意念地位。天是“一大”，或“大上之一”。在人类历史文化上，这是一大超越。至于天的观念是周人所独有，抑或是由各地方民粹发展而成的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神话很多天地并称，但这些神话也可能经过周人的修改和整理。在这些神话中，天比较高妙悠忽，地对人而言，则更确实更关重要。天圆，圆而神；地方，方以智。人体之“方趾、圆颅”（《淮南子·精神训》），一为立足之本，一为玄思之源。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柏拉图单举“圆”的理念来论证“普遍永恒绝对”的真理——圆是不可逾越的，这和西方“二律相背，不能容中”的思维形式是一致的。在古代中华，此相背的二者却是并举的，可以一体，可以容中；神（上帝）、人、与万物都是存在圆天方地之中。《老子》“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三大。”以天为首，但天并不是独一的。按：另本《老子》“人亦大”作“王亦大”；但从“人法地、地法天”文本而观，地之后应是“人”（“天、地、人”）而不是“王”（是“人法地”，不是“王法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人合一”指的也是“人民”，不是“王”（“王权主义”把“民”易为“王”是大大地歪曲了这理念）。

周灭殷后，存活了大量的殷遗民，移置到各地，“以役于西土”。因此，不

少学者以为西周是“奴隶社会”。但古代西方在理念和现实上，奴隶是不被当做“人”的，不但没有人的地位，并被视为是没有“人性”的。而降服于西周的殷人，其领导人物如商容和箕子都被周王尊为圣人。不少殷商族人保有其封地，其“祖宗神”仍继续为后代子孙所祀拜而不至于被遗忘（社稷）。周人据说还“继绝存灭”，把早已被人灭亡或奴役的其他方国人民解放，让他们复国，如夏的后人被封于杞，虞舜后代封于陈等。到了汉代，经史学家还说“王者必存三世，张三统”，一个新的王朝要保存过去已消亡的三（二？）个王朝的后代（“世”）与文化（“祖/宗/统/道统/历法”）——这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没有的。传统文献与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是西周王朝的新意态和新政策。对比周之前“鉞俘”和“以人为牲”的凶残杀伐民粹，这是很重要的超越。

甲骨卜辞的面世使中国文字记载的信史可追索至殷商，但以思想文化史的眼光来看，殷商时代的神权政治、上帝观念和以人为牲的习俗，与日后的中华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差异。中华物质文化的基础虽然奠基于殷商，但富有人文主义的精神文化传统则肇始于西周。孔子已经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在史实上，周人以蕞尔小邦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族，一举打倒当时的文化大国“大邑商”（《书经·牧誓》），是一惊天动地的大变动。《史记·周本纪》有详细的记述：

“周后稷……民皆法则之……天下得其利……子不窋立。……夏后氏政衰……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子鞠立……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按：这是现代俗语说的‘人民用脚来投票的民主’]。……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季历立……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子昌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士以此多归之。伯

夷、叔齐在孤竹……太颠、閼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谥为文王。[正义谥法：‘经纬天地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东观兵……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以东伐纣。十一年……诸侯咸会……乃作《太誓》，告于众庶（广大民众）……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曰：‘远矣西土之人！’……‘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纁、彭、濮人’[按：这是20世纪‘统战/联合阵线’的渊源]……纣兵皆崩畔纣。纣走……自燔于火而死。……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正义：……言先拊循其心也]。诸侯毕从……商国百姓咸待于郊。……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按：这是‘民为贵’理念]。遂入……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间[按：这是当下国内‘平反’理念的渊源]。命南官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官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閼夭封比干之墓。……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按：这是政治上‘多元多方，和冲共济’的典范]。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日夜劳来……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示天下不复用也[按：这是‘和平/和谐’理念]。……后二年，问箕子……以天道[按：这是在政治经济建树初步成功后，继续的学术文化建树]。

……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按：中华传统不是没有“法治”，而是希望人人自动守法，无须动用刑法——德治]。

这可能是把西周理想化了。但这种“理想化”的运作正展示了古代中华的“文化/文明”理想/理念。这种理想/理念和古希腊由极少数的“寡头”精英集体统治的“民主”制度和不断侵略他邦奴役别族的暴行相比较，是远远较为接近“民主”理性的真义的。这种把西周“理想化”的经典，和两千多年后西哲黑格尔

把数千年“日耳曼人的战争民粹”理想化的历史哲学相比较,是大为接近普世“文明大化”行为之理想的。

周人在其“多难兴邦”(这是史实)过程中所经验到的历史教训(“殷鉴”),不但加强了周人原有“戒慎恐惧”的忧患意识,更因此而感觉到天命无常;其整体文化精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宗教思维的方式上,由殷商时充满神秘性的骨卜覡兆,变为富有数理系统的周易象数;在宗教文献的类型上,由人神杂糅的甲骨卜辞(对神的“卜”),变为“子孙万世永保用”的铜器铭文(对人的“鉴”);信仰的对象(西方所谓的“外在”超越),由钺俘无数以人为牲的殷商民族神的崇拜和上帝观念,演变到上天好生好德、光明正直、普照无私的理想;在人权意念上,以土俑取代人牲;至孔子时更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上》);连用像人的俑为牲具,孔子都觉得有辱人的尊严,更不要说用生人为牲了。

西周人文主义精神的兴起,对整体中华文化传统,尤其是精神文化的传统,是一惊天动地影响极为深远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华人文主义传统过度发展的后果是“以人为神”的“造神运作”。清末民初,经古文学家认为“六经”(或六艺——上述周人的文明理想的载体)源自周公;经今文学家认为“六经”出于孔子,都有此倾向。吕君在详论关于周公的各种问题后,提出己见,认为“可以说周公已成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一种符号”。这是很平稳贴切的看法。

序于美国加州大学

陈启云 *Chi-yun Chen*

序 二

一日，忽得庙军博士来电，告其大作《周公研究》即将付梓，并邀我作序。我在主持庙军博士论文答辩时，曾快睹其文，今有机会馈饘学林，确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至于作序一事则颇感踌躇，以本人谫陋的学识，似无资格承担此项工作。劝其另寻名家属笔未果，只得妄言附骥。

关于周公研究，近年已成热门课题，相关论著多有所见。各种资料显示，周公在惨淡经营立国未久的周邦过程中，不仅表现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才智与风范，而且具有大思想家的深刻与卓识。经过东征平叛、封藩建卫、营建洛邑、措置殷遗、制礼作乐等多措并举，周公一手开创了西周持续发展的盛世局面，使中国早期中央集权的统一贵族国家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为了维系和巩固这个新造国家，周公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继承和发展了周人的天命思想，把天命无常与有常的观念统一起来，并以“敬德”精神贯注其中加以阐扬。这样，天命思想除了对周人克殷作为天下共主可以提供宗教上的理论支持外，还成了周人立国后不断进取并励精图治的政治路标。周初宗教思想中这种前所未有的人文精神的跃动，对后来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周公反复倡扬的“德”字，对于国家政权的执掌者来说，已非个人道德问题，而是代表一种组织或主体的道德责任，具有国家伦理的性质。国家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发明，具有给人们带来光明与苦难的两重性。而国家自身的伦理要求与规范，则是其战胜黑暗并走向光明的前进动力。周公主张“知小民之依”，“明德慎罚”，“君子所其无逸”，“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等执政理念，正体现出一种关注社会民生、追求公平正义、强化政治责任的国家伦理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给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因此，无论从什么视角来研究周公，都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学术工作。

本书对周公的研究侧重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与之相关的问题诸如周公是否称王、周公史迹疑点等亦有涉猎。通过细致入微的探索，不少地方体现了作者的学术创见。粗读本书，大体有这样几个印象：

一是资料宏富。研究先秦历史问题，可直接运用的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资料并不算多，但反映古今研究成果的学术文献却相当繁富。作者勤学善思，对已有学术成果多能认真研读，条分缕析，表现出较高的学术洞察力。书中对前贤时彦学术见解的介绍和评述，从论点、证据到方法进行全方位考察，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有利于将研究推向深入。

二是论考结合。上古史研究之难，一在资料匮乏；二在资料良多歧异，解读不易；三在资料较之研究对象而言大多晚出，真伪杂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对问题有宏观把握，又要对材料有微观考证，才能保证言出有据，避免空发议论。作者从中敢于面对学术难题，深化理论说明，加强材料考证，使立论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

三是深度开掘。一种进步的或具有普适价值的思想可以穿越时空，光芒恒在。本书把研究重点放在周公思想领域，细分为天命思想、史鉴思想、忧患思想予以论述，认为三者互相交叉、互相联系、互为包含，从不同侧面彰显了人类理性的光芒，成为周公等周初统治者勤政明德、积极作为的重要动力。作者充分肯定周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注重发掘其当代价值，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学术研究是快乐之程，也是荆棘之路。学术上任何一点进步与发展，都需要学者积累广博的知识激活智慧，通过艰辛的劳动换取成功。相信庙军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能够锲而不舍，发扬蹈厉，做出更大的成绩。

杜 勇

2012年1月23日于天津

前 言

周公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及中华文明史上重要的关键的历史人物。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周公的研究主要围绕周公摄政称王这一热点问题而展开的。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周公的研究倾以格外的关注,因而形成几部有重要影响的系统研究周公的专著。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是对当前全球蔚然成风的“儒学热”、“孔子热”等国学研究广度、深度的拓展和继续,也是对孔子之前的前枢轴时代思想文化的追溯和反思。这些思路和运作的意义无疑都是应当得到肯定的。然而,周公研究的课题涉及的方面和领域特别宽广,加上周公研究本身的复杂性,远非是几部著作所能囊括的。本书择取周公研究当中的若干重要专题尝试进行攻疑补缺式的研究,分别从周公的政治身份、事迹疑点、思想文化诸层面逐一展开。融合了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考证和思辨并重,对周公的诸多疑点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尽可能作出言之有据、合乎情理的诠释,以便能够为推进周公的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尽绵薄之力。

考量周公是否称王的史实,是周公研究中的学术热点和焦点,也是难以回避的历史问题。周公是否称王不仅属于一个历史事实的判断与史学方法论的问题,而且也属于一个名与实的问题。同时,这也涉及对周公政治地位和作用如何正确地进行评价的问题。周公在周初严峻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以成王主要辅臣的身份,力挽狂澜,使周室得以转危为安。以是观之,周公确实起到了关键的政治作用,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周公曾经继承王位并宣布为王。盖周初因武王新丧、成王年幼、三监叛乱等危机局势以及后来周公效劳周室的卓功伟绩导致了很多学者主张周公称王的误解。从传世文献《尚书·周书》的记载来看,很难说周公曾经继承王位、宣布为王即称王的史实。《周书》中出现的“王曰”、“王若曰”

有些应视作周公以成王名义命诰，有些是史官记录之习语。诰文的内容实际均为周公所言。《康诰》中出现的“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这句话向来被视作周公称王的“铁证”。可是，同样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句话是周公在命诰时根据话语对象所使用的插入语。如果再结合西周彝铭有关周王的世系并无周公一世的载录，可以推论周公自己不曾宣布为王。准此，我们可以基本论定周公不曾称王的事实。周公在周初只是辅佐成王，不过因为主客观历史条件的原因使他担当了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尚书·周书》中很多篇目均出自周公或与其有关，这种现象也充分表明周公在周初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周公辅政成王，后人艳称周公摄政，两者含义实质等同。不能因为有后世出现的“摄政王”而据此推出周公称王的结论。对周公其他事迹疑点的研究，除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合理利用之外，还可以采用历史文献考证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相结合的路径，进行多重互证以使结论更加逼近真实。有关周公的一些传说事迹很多具有史实的背景，故亦可视作研究周公思想的素材。

周公思想的内容和来源非常丰富。学术界对周公的史鉴思想、忧患思想关注不够，对周公天命思想虽有论述，但存在着不少的误解需要加以澄清。史鉴思想、忧患思想并非周公一人所独有，而是周初的一种思想共识。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周公身上，既是历史时代的机遇，又与周公个人主观条件紧密相关。周公的史鉴、忧患等思想，是中国前转轴时代的重要标志，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甚为长远。周公的天命思想相较于其前代的思想也属于一种进步意义的思想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周公提出或倡导的“天棐忱”（天辅助诚信，与“天命佑德”近似）、“天命不易”（天命难保）、“天不可信”（天命不可完全信赖）等主要命题上。天命、史鉴和忧患等思想属于周公思想研究中比较大的思想范畴，其中往往互相交叉、互相联系、互为包含。这些思想都从不同层面彰显了人类的理性光芒，成为周公等周初统治者勤政明德、积极作为的重要动力和统治方略。今天看来，这些传统思想资源依然有其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周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本书主要选取有代表性意义的《诗经》、《周易》、《尚书》这三部儒家经典著作进行一些学术整合、辨析厘正、梳理诠释的工作，重点说明周公与三部经典著作的关系程度。具体

而言,《诗经》当中似有一些诗篇确为周公所作,如《鸛鸣》、《大雅·文王》、《周颂·清庙》以及构成《大武乐章》的《时迈》、《武》、《赉》、《般》、《酌》、《桓》六篇。但若据此,即言周公是《诗经》的作者则不当;若说周公与《诗经》有一定的关系尚可。关于《周易》,本书主要探讨文王、周公与《周易》经文的关系,并提出文王、周公合作卦爻辞的新说法。诸多文献记载和卦爻辞的思想韵味表明文王、周公与《周易》确实存在着密切关系,而孔子是《易传》作者的说法却很难成立。孔子晚年学《易》、嗜《易》,与孔子作《易传》并非等同,亦无必然因果关系。此二者实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对《尚书》中周公话语的特点的诠释可以透视周公谋划周密、谨慎持重、细致耐心、平易近人的思想性格。这是周公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世界。周公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面目和身份得以彰显,同时体现出他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关系和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周公不仅在周初政治生活领域中扮演了关键的政治角色,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周公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产生了原发性的影响。故而我们也可以说周公已成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一种符号。

目 录

序 一	陈启云 1
序 二	杜勇 1
前 言	1
导 论：三十年来周公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
第一章 论周公称王问题	69
第一节 对几个关键词的界定	69
第二节 传世文献有关周公称王与否的记载	73
第三节 出土考古文献有关周公称王与否的记载	79
第四节 “推想”周公称王	84
第二章 周公疑点辨正	91
第一节 关于周公身世	91
第二节 关于周公身份	94
第三节 关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	96
第四节 关于周公官职	98
第五节 关于周公纪年	103
第六节 关于周公“捉发吐脯”	104
第三章 论周公的天命思想	107
第一节 “天棐忱”：天辅诚信	109
第二节 “天命不易”：天命难保	114
第三节 “天不可信”不等同于“不信天”	117
第四节 周公是真诚的天命论者吗？	121

第五节 “夏、商蒙昧天命观” 质疑	130
第六节 夏、商、周天命观念刍议	136
第四章 论周公的史鉴思想	141
第一节 史鉴思想是周公等周初主要统治者的一种共识	141
第二节 周公史鉴思想的历史来源和产生	145
第三节 周公史鉴思想的内容和影响	162
第五章 论周公的忧患思想	169
第一节 周公忧患思想的产生	170
第二节 周公忧患思想的表现	177
第三节 周公忧患思想内容和特征	201
第六章 论周公与《诗经》的关系	207
第一节 周公与《诗·豳风》中部分诗篇的关系	208
第二节 周公与《大雅》、《周颂》中部分诗篇的关系	215
第三节 《大武》乐章的作者、篇目及篇次	222
第七章 论周公与《周易》的关系	235
第一节 《周易》的成书时代及作者研究综说	236
第二节 从《周易》之书名看《易经》之成书时代	242
第三节 战国、秦汉以来对《周易》作者的考察和推测	246
第四节 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看《周易》	252
第五节 从周公的巫祝身份看周公与《周易》的关系	254
第六节 关于《周易》作者及成书时代的几点看法	260
第八章 从语言特点对周公思想性格的考察	263
第一节 多用比喻例	263
第二节 多用重言	267
第三节 多用反问语例和否定语例	269
第四节 多用“呜呼”感叹语	274
第五节 多用历史见闻	282

第六节 多用“朕”、“我”、“予”和“汝”、“尔”.....	287
结 论.....	297
参考文献.....	301
后 记.....	317

导论：

三十年来周公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些年来，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人物的研究蔚然成风、方兴未艾。其中周公研究也逐渐在学术界受到关注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周公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异彩纷呈。从学术史角度比较全面地总结和评述这方面已有的学术成果，分析其得失，对今后周公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及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当中都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关键的历史人物，人们常习惯“文武周公”并称，实际上，周公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远在文王、武王之上。前辈学者夏曾佑先生曾言：“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1]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的叔父，其采邑在周地，故称周公。周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又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的鼻祖或元圣。由此可知，周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甚巨。所以自周公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无数哲时贤几乎都言及周公、称誉周公，并对周公寄予了深情厚谊。关于周公相关事迹和思想的研究，也无疑成为学术界研究和评论的焦点和热点。时至今日，距我们约 3000 多年的周公，他的流风余韵依然源远流长。有人颂扬，有人非议，有人折中，周公的形象在中国的历史上迈过了一段一段的非同寻常的漫长崎岖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时期，周公的研究陷于“影射史学”的泥滩，

[1]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 页。